

依田百川《谈丛》的文本性质及其散文 风格——兼与归有光散文比较

董上德*

〔摘要〕

日本学者依田百川的汉文著作有《谭海》、《谈丛》传世。本文拟对《谈丛》做初步探讨。认为《谈丛》一书有诗文“丛稿”性质，基本上与通常意义的“笔记小说集”无涉。若不实际地将《谈丛》视为“传奇体小说”或“奇人异闻文言短篇小说”，或笼统地将《谭海》和《谈丛》均称之为“虞初体”，这将会不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汉籍在传入日本之后其影响力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日本学者在汉籍接受史上所做出过的自己的努力。《谈丛》的文风接近归有光，依田与震川，在心性上有其相通之处；他们同样嗜读《史记》，这也是两人文风相似的远因。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依田的散文，尤其是杂传，其史家意识更为自觉，这一点，比归有光还要突出。不苟且，不逢迎，这是依田散文的可贵之处。

关键词：依田百川、《谈丛》、杂传、记体散文

*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日本学者依田百川（1833-1909），名朝宗，字百川，以字行，号学海；出生于江户时代的末期，几乎亲历了整个明治时代（1868-1911）。年轻时曾从藤森天山受经史之学，打下深厚的汉学功底。自称：“百川黑瘦多髯，身无缚鸡之力……为人傲岸，不修边幅”；又说：“壮岁沾沾自喜，颇志功名”；曾出任地方官会议书记、修史馆三等编修等职。其本人相当重视自己的汉文写作，对自己的史学修养也颇为自负，自述其著书宗旨为“百川一以劝惩为主”，对当时一些浮浪学者的著作“多鄙俚淫靡语”表示极大不满。¹其汉文著作有《谭海》、《谈丛》传世。

中日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对“汉字文化”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我们今天研究日本学者的汉文著作，当会深化对这一方面的认识。

依田百川的汉文著作所具有的特质，不仅仅属于日本文化，还关涉到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问题。我们在“汉字文化圈”的背景下考察其散文写作，既可以借鉴其写作经验，又可以以之作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

本文拟先对依田百川的《谈丛》做初步的探讨，尤其侧重于研讨其杂传散文与记体散文。

一、《谈丛》文本性质辨析

《谈丛》的文本性质与《谭海》显然有异，依田氏门人冈崎壮在《谈丛凡例五则》明确写道：“（学海先生）尝辑录近世异闻奇事，著《谭海》四卷，久行于世；今复就稿中抄出尔后所作，厘为二卷，其改题者，以体裁不同也。”²换言之，《谈丛》不是《谭海》的续编，故而改了书名，以示区别。《谭海》的特色在于“异闻奇事”，其趣味近乎小说；《谈丛》的旨趣却是“据实直叙”（冈崎壮语），几无小说意味。更何况，《谈丛》“有诗有文，有传有记”，“体例驳杂，非尽叙事”³，基本上与通常意义的“笔记小说集”无涉。其以《谈丛》命名，标明该书有诗文“丛稿”性质（其中，诗少文多），当无疑义。

¹ 参见《依田百川自传》，载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256-259页。

²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33页。

³ 同上，《谈丛出版说明》，第3页。

可是，学术界对此书的文本性质却另有看法，如李进益先生在谈及张潮的《虞初新志》在日本的影响时说：“至于受到张潮《虞初》一书编辑体例启示，并且于无形之中仿效写作奇人异闻文言短篇小说，……则属菊池三溪《奇文观止本朝虞初新志》与依田学海《谭海》、《谈丛》三书最具代表。”⁴在李先生看来，此处提及的三部书都是仿效《虞初新志》而写成的“奇人异闻文言短篇小说”。又如孙虎堂先生认为：“《谈丛》以杂传体小说为主体的特点与张潮的《虞初新志》相类。”⁵孙先生明确指出《谈丛》的特点是“以杂传体小说为主体”。李、孙两位先生都不约而同地认定《谈丛》具有小说意味。

其实，《谈丛》里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传记类散文，称之为“杂传”或许更为合适，但是，它们不是“杂传体小说”。《谈丛》卷一末尾有杉山令所撰“跋语”，称《谈丛》“比之虞初稗史，徒弄巧炫奇，以资嬉笑者，相距不啻霄壤。是可以见先生之志矣。”⁶通读《谈丛》可知，其中的传记散文有如归有光在《张自新传》里所言，其写法是“叙列其事”，⁷即大体“据实直叙”，并无虚构，没有“弄巧炫奇，以资嬉笑”的东西。故而，《谈丛》卷二末尾信夫絜的“跋”称：此书“事确文健，可以补史传之阙，可以备史家之采择，岂可视为寻常说部之类乎？”⁸审之以《谈丛》的实际内容，其言不虚，并非如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之“小说者，正史之余也”那样故意装扮门面、自抬身价。⁹

我觉得，辨析《谈丛》的文本性质，并非是多余之举，从中可以看出，自《虞初新志》等中国说部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一方面喜其新奇怪异，有所仿作；另一方面，又在吸收消化的过程中有所纠偏，以“杂传”的形式比较及时地记录了当时（主要是明治时期）一些可能被人忽略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偏离“小说作法”，突显史家意识，并且有所担当，不负时代，不负英雄，不负奇才，这才是《谈丛》这一类著述的意义所在。正如信夫絜为《谈丛》所写的跋语所言：“近

⁴ 李进益《虞初新志在日本的流播及影响》，载《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526页。

⁵ 孙虎堂《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⁶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143页。

⁷ 《震川先生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02页。

⁸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261页。

⁹ 《今古奇观序》，载黄霖等选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时诸家竞刻文章，率应酬陈套，奉承俗习，无一可以备后世参考者。此编出一家言，而寓意其间，以规讽当世，警醒后人，自有不朽者存焉；读者概以为《虞初》、《聊斋》一种，徒称其新奇，大非作者之意也。”其实，就以《虞初新志》而言，其中既有很多颇具小说意味的作品，如《鬼母传》、《狗皮道士传》、《烈狐传》等等，殊为怪异，也有一批大体不失其实的“杂传”，如《徐霞客传》、《马伶传》、《五人传》等等，这两类作品混编在同一部书中。¹⁰而依田百川分别编辑《谭海》与《谈丛》，两部著作的文本性质并不相同，显然在“文章辨体”方面下过功夫，这种做法显然体现出头脑清醒、精细敏锐的日本学者在接受、学习和消化中国传来的汉籍时有其更加微妙的“文心”。目前，中国学者对日本汉文著作的研究日渐深入，若不切实际地将《谈丛》视为“传奇体小说”或“奇人异闻文言短篇小说”，或笼统地将《谭海》和《谈丛》均称之为“虞初体”，这将会不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汉籍在传入日本之后其影响力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日本学者在汉籍接受史上所做出过的自己的努力。

二、《谈丛》的杂传散文

《谈丛》凡二卷，第一卷收录杂传 15 篇¹¹，第二卷 30 篇¹²，合共 45 篇。

这一批杂传，大体写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兹粗略例举如下：

1. 为结束幕府统治而有所贡献的英雄，如《西山尚义传》、《赖三树》等。
2. 幕府末期德川氏旧臣中的开明之士，如《小栗上野传》等。
3. 明治时代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如《成岛柳北》、《铁舟居士传》等。

¹⁰ 《虞初新志》，上海书店出版（据开明书店 1935 年版复印），1986 年版。

¹¹ 第一卷所收杂传篇目为：西山尚义传；赖三树；森田节斋、藤井竹外；成岛柳北；小花传；曙山；丸山传右卫门；铁舟居士传；小笠原明大传；飞针伎；津田三藏；本间弥平治传；矢野五右卫门；远山归云。

¹² 第二卷所收杂传篇目为：金森多吉传；古川重吉传；松堂公子传；菅椿村小传；武田竹塘先生传；节母中村孺人望月氏传；林权助佐川官兵卫合传；北泽兰壑传；担枪勘助传；新田义宗肋谷义治二公逸事；了然尼传；平田笃胤传；富田夫人传；妙林尼传；聋僧默霖传；村田春海传；小栗上野传；高尾传；塙检校传；藤井喜一郎君逸事；和多田贡传；白龙山人传；小琴传；三才女传；向栗二先生传；向山横村传补正；川田瓮江先生传；依田家传；依田柴浦先生传；依田百川自传。

- 4.明治时代有节操的民间艺人，如《小花传》、《曙山》等。
- 5.明治时代有政声的政治人物，如《本间弥平治传》等。
- 6.明治时代任侠好义的下层市民，如《金森多吉传》等。
- 7.明治时代初具民主思想的年轻贵族，如《松堂公子传》等。
- 8.明治时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杰出人士，如《菅椿村小传》、《武田竹塘先生传》等。
- 9.明治时代精勤慈爱的家庭妇女，如《节母中村孺人望月氏传》等。
- 10.明治时代有奇志的宗教人士，如《聋僧默霖传》等。
- 11.明治时代深有造诣的艺术家、文学家，如《白龙山人传》、《三才女传》等。

种种人物，诸多事迹，犹如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碎片”；他们见证着历史，他们的事迹本身也是形态繁杂的“明治”历史的组成部分。比如，《丸山传右卫门》，是很有历史感的一篇杂传。传主本是一位“幼敏慧，夙精工事，算计稠密”的土木工程专家，卒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此人的岳父富甲一方，无子，只有一个女儿，故而传主在岳父去世后继承其家业；又因为善于经营，获利无数。其人并非只顾赢利之辈，颇有“器识”，又值明治维新的时期，在经商之余，兴办教育，“尝捐资建学校于深川，延教师训导子弟，名曰‘丸山学校’。”可见，他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同时，他是土木专家，既有钱，又颇为自负，认为“近世少识土木之工者”，嫌当时的建筑风格徒有其表，只追求外在的漂亮，不讲究内在的韵味，于是，自己设计，聚集良工，建造一座“奥山阁”，用料考究，布局精巧，体现其造园构思之美。落成之后，果然成为一时建筑之楷模，甚至是，“皇上游幸城外，一过之，人以为荣”。可谓声名远播，大为风光。当然，传主的这种做法颇有炫富逞才之意。可是，出人意料，奥山阁建成之后数年，日本社会的经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物价低落，市情大变”，传主本来囤积了不少建筑材料，因为价格瞬间的低落而损失惨重，传主不得不变卖家产以应付突如其来的逆境；其后，情形日益严重，他本人引以自豪的奥山阁也最终易手，变为他人手中之物。最后，传主“贫不能自给，赁家以居，破屋二间，写经糊口，向之宾客交友，无一人来问者”。世情之冷暖，竟有如此惊人的反差，传主的家族史，如同一部微型的《石头记》。后人读到这些杂传，恍如重访历史的断垣残壁，去体验，去吟味，去想象，或许，这正是依田氏写作这些作品的初衷。

依田百川的笔触，或热情，或冷峻，或二者兼而有之，他记录了明治时期的一批人物的事迹。对于这些人物，他没有使用小说笔法。其中，不少人物还是作

者的故旧、亲戚、同僚以及有所交往的人士。作者的写法颇似归有光，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以摹写出传主之“神”为主，常常寥寥几笔，如叙家常，神气活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仙蝶传》，篇幅不长，而传主的风神、气质跃然纸上：

仙蝶者，吾友梅潭居士侍婢也。颊丰而长身，语娇而柔体。初为新桥名妓小松所妹蓄。蝶气韵极高，不喜郑卫之音。小松教以歌曲，督责甚严；蝶不恻，尝曰：“吾不欲售媚于人。安得脱此苦界，侍名士笔砚，以毕生涯乎！”时年十五。居士闻之，曰：“是奇女子也！”乃出重价购之，蝶大喜。未几，母病，蝶归家视之，看护具至，终不起。居士厚贖之。既而父欲嫁之人，蝶不肯，誓归梅潭。或笑梅翁六十餘，卿甫二十，白头红颜，岂不免梨花海棠之毀耶？蝶笑曰：“先生脱妾火炕，是我活如来耳；妾一生香火事之，足矣。”¹³

此传中的女主人公仙蝶，是作者有所交往的人物，是其朋友的一位侍婢。文章要言不烦，而信息量颇为丰富，如读者可以从文中了解到，仙蝶有父母，而双亲早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她卖给名妓小松氏；小松氏为了借仙蝶的才色获利，平时迫使她学习“郑卫之音”，训练其媚态，淫荡其心性，以迎合各种嫖客的需要。而仙蝶冰清玉洁，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人格，当着小松氏的面表示“不恻”，抗拒其淫邪的“培训”，以至于其言其行传扬开来，为开明之士所知。这些都是作者没有明写而读者自可意会的。同时，在传中，作者有选择地描述了几个细节，即可将仙蝶刚强的品性、高雅的气质、柔顺的孝道、独立的人格以及知恩图报的胸襟一一写出，故此，在篇末，村山拙轩氏评论道：“梅翁高情，佳人深情，先生文情，可谓三绝。”此语并非过誉。

《丛谈》作者“据实直叙”的写法，为明治时代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剪影，兼具文学、史料两方面的价值。

三、《谈丛》的记体散文

《谈丛》除一批“杂传”外，还有一批记体散文，就其数量而言，仅略少于

¹³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56页。

“杂传”。其内容多为山水小品，作者每至一景，以百字左右记其独特、绝异之处，似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如《雾积志踪》之“美人桥”：“由阪木驿往半里，右折而入，为雾积山路。登顿上下，车行渐艰，奇景渐出，得美人桥。清泉自左崖洒下，水声锵然，过桥下入涧；涧中奇石嵯峨，水触焉，碎为飞沫，极清丽。涧上多松，苍翠欲滴，与岩石相映，又是一美丈夫也。”¹⁴绘声绘色，文字简洁；字里行间，极其“唯美”。同一篇另有一题为“游仙峡”，也是堪称“美文”：

是为雾积第一绝胜处。有桥以枯柴为梁，土覆之，自一至三皆然。过桥巨岩屹立，其左苍藓蒙被，杂以细草，石色苍润，或带赭；右则纯是石山，削立百仞，对峙成峡，怪石罗列水中者，或侧立，或偃卧，色或滑泽，或丹赭，一无相肖者。涧泉从上流，奋迅而奔。来第二桥下，为瀑，为潭。有一石，竖立其中，上圆下方，苍苔缀之，宛然屏风也。水至是缓慢，为浅濑，文石可数。峡前后密树交加，不透曦影。冷气彻骨，不能久立。稍上，至第三桥，涧分为二：右来自金洞瀑，左则响过桥下者也。

其描述可谓精准细腻，一方面，是其空间感极强，一方面是视觉、听觉、触觉错杂交织，将游仙峡之气魄、幽趣以及由三道桥所划分出来的山水层次一一呈现。篇末有菊池三溪的评语，曰：“予尝读袁中郎西湖诸记，篇篇绝佳，令人神心孤往也。唯彼山水平淡，是以乏变幻奇拔之致。今读雾积之记，霏烟吐纳，水走石立，驾袁记上者数等。”¹⁵依田散文是否高于袁中郎，自可见仁见智，但是，菊池氏指出依田的这类山水小品写出一山一水的“变幻奇拔之致”，确是的评。

此外，书中亦有一些文章记述观摩技艺表演，如《古市樱花楼观音头舞记》、《太庙观神乐记》等。还有少量的堂记，如《墨水别墅避暑记》，内含若干小题，记屋宇，记人事，笔触灵动，于细节处见精神，其笔法、章法类似于归有光的《项脊轩记》，如篇中有一题为“学海书屋”，其文如下：“余十八九，在先师塾，尝读书。师问：‘尔何别号？’答以无。师笑曰：‘尔名朝宗，宜称学海。’后十余年，师在下总，余往访之，师授以此，余大喜拜谢。无几，师下世。其书益可宝。尔后，迁移不一，然书房之匾必用此，未尝不想见师之声音、笑貌也。书屋

¹⁴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75-76页。

¹⁵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78页。

前，有芭蕉一株，高可七八尺，绿叶如盖，遮蔽炎日；又有紫薇花，灿如红锦，与师书相辉映，可以为此屋伟观。”¹⁶一段没齿难忘的师生情谊跃然纸上。写的虽是书房的一块匾，但作者的用意在于写情；而老师的关爱与期许，自己对老师无尽的追怀和忆念，都写得温润无比；淡淡的笔墨与浓浓的深情，适成对比。篇末的芭蕉与紫薇花，一绿一红，与书房之匾相衬，闲闲写来，却也透出一份雅致，雅致的背后是人世的温馨，以及幽幽散发着的书卷气息，从而可见作者的学养、心性与情趣。同样与书房有关，同样是缅怀前尘往事，同样间杂着日常的对话和细节，令人自然而然联想起《项脊轩记》等文的描述风格与回味无穷的情韵。

四、《谈丛》的散文风格及其与归有光散文笔法的异同

《谈丛》中的“杂传”与记体文章，内容丰富，多数堪称“美文”。其散文风格，大体而言，崇尚“秀美”，格局精巧，善于剪裁生活琐事，喜欢用细节说话，以小见大，寓意高远，而且不掩饰作者的好恶，其文每每有一个“我”在。书中的各类记体文章更是抒写出自己的情趣、学养及审美眼光。总之，依田散文长于捕捉历史的“碎片”，借助众多的“碎片”向读者提供窥探历史的“窗口”，以入世的眼光观察社会与人生，展示俗世人生的多个侧面，且能俗中见雅，终以雅趣为尚。

就其细腻、平易的文风而言，依田散文与归有光散文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信夫恕轩在《墨水观月记》的末尾作评点云：“全篇不求巧而巧自至，平生所养可知矣。若比之古人文体，其归有光耶？”¹⁷洵为知音之言。从依田百川的心性看，他敏锐、细致，观察入微，情意绵长，故而其文风接近归有光，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我们知道，归有光的名篇如《项脊轩记》《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善于“忆述”，擅长细节描写，尤其以对于日常生活素材的提炼见长。归有光的文章也是“不求巧”，似乎信手拈来，如话家常，没有刻意经营，而写来却也显得精致、灵巧，这些都是人所共知，不必赘述。归氏散文与依田散文的确在文体风格上颇为相近。此外，依田百川与归有光，在心性上也有其相通之处：他们同样嗜读《史记》，同样从《史记》中借取司马迁的神韵，继承太史公的遗风，这恐怕是

¹⁶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41-42页。

¹⁷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89页。

两人文风相似的远因。而信夫怨轩以“归有光文体”比拟依田散文，是恰如其分的，从中可知归有光散文在日本所受到的重视，以及在日本文人中所产生的影响。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依田的散文，尤其是杂传，其史家意识更为自觉，这一点，比归有光还要突出，这与依田曾入修史馆的经历有关。他在《依田百川自传》中写道：“（明治）八年，诏开地方官会议于东京，以参议木户孝允为议长，征百川为书记官，叙正七位。寻迁修史局三等修撰；改局为馆，为四等编修，进三等。……”可知，他进入修史局（馆）时，已经40多岁了（明治八年，即1875，依田42岁），以其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养从事修史工作，可谓得其所宜，并且，他还在自传中称：“最喜叙事，文不甚锻炼，而一气贯注，自言有气力。”¹⁸因而，依田对自己的散文，颇为自信，也自有面貌。经过如此职业训练，依田对杂传的文体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其杂传不带小说笔法，自是在情理之中；他将笔记小说与杂传做出明确的区分，在文章辨体方面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与此相关，他的史家意识同样自觉，《谈丛》里的杂传，若组合起来看，可视为明治时代的一幅幅鲜活的“众生相”，几乎看不到应酬之作。相较而言，归有光应酬文不少，《震川先生集》里，赠送序、寿序、墓志铭、墓表、行状等等，占了很大比例。而依田的文章，写起来更为讲究篇篇“传世”，不苟且，不逢迎，这是依田散文的可贵之处，也可见日本学者的精细用心。

¹⁸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259页。

